

新大众文艺在聊城

我是一只『夜猫子』

张金芳

2003年,我响应号召,与一众人年轻职工一起从其他工厂转入碳素厂,有幸见证了这座新厂区从一片荒芜到基建成型、再到顺利投产的全过程。建厂期间,从土建施工、烘炉调试到正式步入生产正轨,每一个环节,我们都亲身参与、全力以赴;平整土地、搬抬水泥、填炭烘炉,车间里、工地上,处处都是我们热火朝天忙碌的身影。那些晶莹的汗珠,那些清脆的笑声,那份青春的热忱,至今想来仍令人动容。

厂区步入正常生产后,我们开始了三班倒的工作节奏。第一次倒班赶上歇大班,从来没有上过夜班的我,当时还不懂这份歇班的珍贵,也不知道趁此机会回家看一看,反倒漫无目的地闲逛了一整天,白白浪费了难得的空闲。直到后来,我才知道这样的大班不是天天都能歇,也真正体会到了三班倒的艰辛。昼夜颠倒的作息,日复一日的疲惫,渐渐磨平了最初的懵懂,也让我对这份工作有了更深刻的体悟。

之所以成为“夜猫子”,既不是手机太黏人,也不是追剧太上瘾,更不是游戏打入了迷。促使我熬夜的真正原因是工作,作为一名三班倒的产业工人,每月都有一多半的时间需要熬夜“渡劫”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熬习惯了,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“夜猫子”。

傍晚时分,城市褪去白日的喧嚣。华灯初上,别人或摆个地摊,呼朋引伴,推杯换盏;或挽着男友,花前月下,卿卿我我,而这一切的热闹和惬意,都与我这只“夜猫子”无缘。我必须早早休息,养足精神,才能抵御上夜班时可能袭来的困倦。或许你会说,早休息也是一种享受?其实不然。昼夜颠倒的作息,早已打乱了身体的生物钟,躺在床上,辗转反侧难以入眠,有时好不容易与周公见上面,不识时务的闹铃又响了起来。经过起床与不起床的激烈思想斗争,从被窝里挣扎着爬起来,刷牙洗脸,一路跌跌撞撞地去上班,还阿Q似的自我安慰:“这叫众人皆睡,唯我独醒!”

到了班上,起初还精神抖擞,可随着夜色渐深,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,困

倦便一步步逼近,怎么赶也赶不走。睡觉是不可能的,查岗人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把你逮个正着。更何况,我值守的主控室,掌控着车间所有设备的运转与物料的排送,每一个操作都关乎生产安全,稍有不慎出现差错,便吃不了兜着走。效仿古人“头悬梁,锥刺股”吧?不好使。于是我便在室内来回踱步,以驱散困意。“从窗子到门是七步,从门到窗子还是七步。”这是捷克作家伏契克《绞刑架下的报告》里的句子,每次踱步,我脑海中总会冒出这句话。不过,我值守的这间主控室,可比书中的小屋宽敞多了,从门到窗子是二十步,从窗子到门,自然也是二十步。没想到这招还真灵,困神被我念叨走了,我重新活力满满地投入工作。

上夜班的日子久了,竟也渐渐从中品出了几分别样的乐趣:排料铃一响,“隆隆”的斗提转动声、“嗡嗡”的运输机震动声以及“哗啦啦”的排料声交织在一起,似万马奔腾,如雪浪拍岸,成了车间里最有力量、最动人的乐章。若是这曲“生产交响乐”突然停歇,久久没有响起下一段旋律,那一定是生产出故障了,得赶紧向值班班长报备,通知维修人员检修。每当此时,心中便会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之重,也愈发不敢有丝毫懈怠,愈发尽心尽力地守好每一班岗。

上夜班的日子,有一件事始终困扰着我——晚上不敢独自去上班。想想从家到公司那段黑漆漆的路,心里就直打鼓。丈夫自告奋勇护送,但他白天上班够累了,半夜再起来送我,实在太辛苦。后来,我索性趁天还没完全黑透就赶往公司,在宿舍先对付半宿。在宿舍休息时,常常会做些细碎而温暖的梦:梦见婆婆晒过的暖烘烘的被子、特意留的可口饭菜。卧室里橘红色的灯光、灯光下丈夫憨憨的睡态……

梦里的美好,疗愈了工作的疲惫,激励着我用加倍的努力成就更好的自己。

因为上夜班,丈夫抢着做家务,我便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;因为上夜班,婆婆总会在我做饭时多添一个鸡蛋;因为上夜班,领导也会给予诸多关照,让我感动好半天。夜班给了我遗憾,却也给了我更多的温暖。

顾城有首诗写得真好: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,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”成为一只“夜猫子”不是自己能选择的,我有过遗憾,有过抱怨,有过深夜的疲惫与迷茫,可一路走来,也从中得到了很多。我在深夜里坚守,在疲惫中前行,在平凡的岗位上,努力发光发热。那些熬夜的时光,那些坚守的日夜,那些家人的牵挂,那些对工作的热爱,终究成为了我生命里最珍贵、最难忘的印记。二十余载光阴流转,那些藏在深夜里的故事与感动,依然在记忆里闪闪发光,给予我继续前行的力量。

铸造工

王栋

如果把制造行业比作江湖的话,那么我们铸造厂就是江湖上的“丐帮”。老板自然是帮主,行管人员是“净衣派”,一线员工就是“污衣派”了。如果你走进铸造厂,看到厂里的工作环境,就会认同这个比喻。

1

我是一名清理工,是经年累月在一线摸爬滚打的“污衣派”弟子。我的工作是为给铸转几道工序后,来到我面前的铸件做“手术”,或者说是“美容”。只不过,我的装备不是墨绿色的手术服,不是无菌口罩,不是手术刀,而是工作服、眼镜、防尘口罩、手套。我的工具是一台砂轮机、一只磨光机。外科医生治病救人,是把病人身上的坏死组织、病变部位切除掉,我的工作是把铸件身上多余的部分——浇口、毛刺、疙瘩清理掉。

一切准备就绪,我按下开关,砂轮飞速旋转,铸件贴近砂轮,一场硬碰硬的厮杀开始了。铸件被砂轮“屠戮”,铁质的肉身被撕碎,发出刺耳的尖叫,化成一道道火花,火舌瞬间熄灭,落在地上,是无数细得不能再细的尘埃,这是铁屑与砂轮肌体的混合物。这尘埃,不仅落在地上,还有许多沾在脸上、鼻子两边,钻进头发、衣服里,吸进鼻腔、口腔,进入我的肺部。而那噪音就像一群蜂,蛰伏在我的耳朵

请把我在黄沙里

赵广砚

发现了60个海子和海子边水草丰美的牧场。从此,这片沙漠就有了“巴丹吉林”这个美丽的名字。然而,美丽的传说总是与现实相距甚远,真正的巴丹吉林更像“吉林”的另一层含义——地狱,这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。

在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士兵的同时,我对沙漠也渐渐有了好感,开始正视它,积极向它靠拢。有一次,我梦到自己爬上了祁连山,站在高高的山巅,遥望群山绵延,天地是那么开阔辽远。回过身来,我看见动荡不安的沙漠,像是千百头猛兽,匍匐在干燥的大地上,时而怒吼,时而翻动身躯。戈壁滩依旧如过去一样荒芜苍凉,人们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耐旱的植物,却始终掩盖不住裸露的黄色泥土,山头一个接着一个,向后隐去。

在我们居住的营房外面,除了一排稀疏的白杨树和扭曲的沙枣树,便是一望无际的浩瀚戈壁。沙尘暴是这里的常客,每次前来造访,风沙先是在远处掀起一团灰黄,接着迅速膨胀,高达百米甚至千米,疯狂地漫卷而来。狂虐的大风裹挟着亿万颗沙砾,鹰击箭啸,吞噬噬沙漠、营房和附近的村庄。世界一片黑暗,万马奔腾的声音越来越远,直抵耳边。这时候,即使房门紧闭,窗户封死,依然挡不住风沙侵袭。不一会儿,衣服、头发乃至嘴唇都塞满了沙尘,一说话就咯吱咯吱地响。

在沙漠待久了,我必须得承认,在这样一个庞然大物面前,个人的能力和思想是极其有限的。多少年了,在这片戈壁上,在我之前之后,又有多少人来到,消失和走开呢?一个人的漫步,与它身上任何一颗滚动过的沙砾没有区别。在大漠戈壁的月光下,我仿佛看到一个梦幻中的自己,安静、纯洁、全身透明,在午睡半醒间看到自己战死沙场,骨骸和往事一同被风沙埋葬。待我醒来,世界依旧、生活照常。

老兵们说,不到沙漠深处,就不是一个有深度的人。上世纪50年代,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将军率部开赴戈壁大漠,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试验场创建任务。为了修建从酒泉市清水镇通往基地发射场的铁路专线,部队委派1名参谋和5名士兵进行勘探,周期是10

天。10天过去了,他们没回来。又过了10天,他们还是没回来。那时没有手机,没有北斗,更没有GPS全球定位,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官兵心中。紧锣密鼓的建设工作被按下暂停键,除了战备值班,所有人参与大规模搜寻任务。最终,战友们在离勘测点不足两公里的一处沙丘附近找到了他们。6名战士双脚紧紧并在一起,身体围成了一个圆形。风沙掩埋了他们的面部,皮肤早已失去弹性,却并没有腐化,而是风干成一个坚硬的雕像。后来分析,他们应该是在勘探过程中迷了路,用完了粮食和水,体力消耗殆尽。生命的最后,战士们双脚并拢,围成圆弧,用最美的队形与这个世界告别。找到遗体后,战友们的6位英雄就地掩埋,又运了一些砖头和石块,为他们垒了一座坟冢。

听说这个故事,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很惦念他们,想去看看他们。很多次,我在梦里遇见他们,与他们畅谈理想、故乡甚至爱情和人生。直到一个冬日的清晨,我真的带着好烟好酒去寻找他们骨骸遗落的地方。那天的太阳还算温和,踏着薄薄白雪和黄色的沙砾,听着自己的脚步声和远处传来的火车汽笛声,心中充满了从未有过的神圣和使命。寻找并不顺利,戈壁滩除了茂草和骆驼刺枯萎的枝干,一无所有。几个小时过去,鞋里灌满了沙子,却依然没有找到。我望了一眼天空,一块乌云遮住了太阳,我知道,这一趟拜祭之行是没有希望了。回程路上,看到一位骑三轮摩托车的师傅,急忙跑过去拦住师傅问,您知道附近有个墓吗?就是好几个人埋在一起的那个墓?师傅说“不知道”。车辆启动了,师傅突然大喊着向我摆手说“我想起来了,有!有!以前是有个坟头,去年迁走了,听说迁到航天城那个烈士陵园了。”

我们急忙驱车,赶往百公里外的航天城。在航天城的东北角,松柏与红柳掩映处,原国防部长张爱萍上将题写的“东风革命烈士陵园”八个鎏金大字,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。这里埋葬着开国元勋、航天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领导者聂荣臻元帅的部分骨灰,还有300多位曾经在戈壁滩战斗过的英烈,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墓碑,犹如阵容严整的方阵。在陵园最后一排,我

的刘海大了一旬——刘海也43岁了。但要说工龄最长的,非玉强莫属。玉强下学早,15岁就干铸造,从前到后的铸造工序他都历练过。之所以需要四个人,是因为一吨多的铁水必须在十几分钟内倾注到型腔里,温度低了,铁水流动性差,铸件往往有缺陷甚至是废品。还有一点,重量大的铸件需要两勺铁水才能注满,四个人两组就是最佳组合。

四个人各有各的故事。他们都有一个老婆、两个孩子,孩子们的成长之路千差万别,为父母者也就甘苦自知了。最令人唏嘘的是军哥,他有两个儿子。长子是亲生的,老二,把家安在了烟台。次子是继子——军哥十多年前结发妻子不幸病故,续弦又给他带来一个儿子。这孩子彼时十多岁,现在已近而立之年,不怎么省心,前年因醉驾致人死亡入狱,还要赔偿90多万元。为了还债,军哥戒烟戒酒,拼命挣钱。他们的经历,正如托尔斯泰所说,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,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

铸件工也要在高温环境里辗转腾挪,把刚浇注好的工件装箱摆好。即使三九严寒,他们也是汗流浹背,衣服紧紧贴在身上,整个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,汗水洒落在黑色的砂子里瞬间无影无踪。翻砂箱时,被高温铁水烘干的砂子升腾起一团烟雾,人就在这尘土飞扬中穿梭。老柳就是一名铸件工,光头是他最醒目的标志,据说他在寒冬的车间外卷起裤腿洗澡也无所畏惧。当然,这是没有办法的事,这就是工作太脏了!

虽然我们厂通过技术改造升级,劳动强度有所减轻,劳动环境有所改善,但浇注、清理、机件还是得用最原始的手段去完成,依然要和尘埃“耳鬓厮磨”。

承蒙厂领导抬爱,让我从尘埃

弥漫和机器轰鸣中解放出来,成了“净衣派”的一员,但我和一线工作,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,不过跟“尘满面,鬓如霜”的日子相比,已经是天壤之别了。回想往昔,真有恍如隔世之感。

4

有人说,铸造不就是翻砂吗,有什么难的?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!只要有力量,这活儿,傻子都会干!

这话说对了一半。要说干,可能谁都能比画两下撑上几天,但几年、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坚持在一线,绝非易事。没有健壮的体格不能胜任它的繁重,没有吃苦耐劳、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也坚持不下去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这些年厂里工人来来去去,不知道换了多少茬。这当中,有人因长时间高强度劳作导致腰肌劳损或腰椎间盘突出被迫离开,更多的是那些羡慕高薪又不肯付出的求职者,所以对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下来的同事,我都抱有深深的敬意。

一个铸件,要经过造型、浇注、清理等十几道工序才能成为客户手中的合格产品;一块原铁或废钢,要在烈火中熔炼,才能蜕变成合格的、有更大价值的另一块金属;一个人,要经历怎样的磨难,才能顶天立地无惧无畏?或许,铸造人的烈火青春可以告诉你答案。他们用青春、用血汗给企业创造价值、给家庭添砖加瓦的同时,也奠基着祖国的基础工业,铺设着祖国经济腾飞的跑道。没有他们的汗水,写字楼里精英们噼里啪啦打出的订单始终是一纸空文;没有他们的劳动,天文数字的GDP又将减少相当的份额……尤其是看到那些打着我们厂Logo的产品、看到亲手铸造亲手打磨的产品用在某个国家工程上,所有的劳累苦痛都化成自豪的泪水——铸造人一样了不起!劳动者无上光荣!

致敬我自己!致敬铸造人!

们找到了6名烈士的墓碑。墓碑正面写着无名烈士墓,后面写着他们的牺牲经历和迁葬过程。由于保密的原因,当年他们就地掩埋时没有留下姓名。单位几经整理,相关档案也遗失了。后来经过DNA检测,他们去世时最大的不到三十岁,最小的十八九岁。我给他们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,用衣角轻轻擦拭石手,手掌依次抚摸着每一个细节,沿着汉字的指向,我结识了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,从未谋面却又如此熟悉,他们都是我灵犀相通的战友、兄弟和师长。

这300多座墓碑,这300多位不死的英雄,在巴丹吉林沙漠甘西一腔热血。我至今记得一个名字——李幸福,在一次执行任务时,他从发射架上重重跌了下来;还有一个战士叫王来,1965年10月20日,一名战友在泄除加注车内的多余液氧时突然失火,王来飞奔相救,身上顷刻间燃起熊熊大火。为了保护战友生命和设备安全,他拼命朝远处跑去,最终倒在了戈壁滩上。

落日如血。60多年过去,24000多个日日夜夜弹指一挥间。从1958年毛泽东亲自批准组建导弹基地到现在,一个又一个倒在这块土地上的战友,住进了这片大漠深处的墓园,在另一个世界,聆听着时代的急骤蹄声和岁月变迁、世事交替的摩擦声。他们和“神树”胡杨一样,即便被风沙夺走了生命,躯体依然是战斗的模样;即便有一天不能再站在人世,依然挺直着不朽的脊梁。

叶子在季节交替中改变了颜色,从诞生到坠落,就像人生的宿命。我越来越觉得,自己已经是巴丹吉林的一部分了,那个天高地阔的西域荒漠,才是真正适合我的地方。正如我的儿子赵砚航,虽然他在老家临清出生,但大部分时间都跟我在大漠军营生活,以至于在他眼里,戈壁滩上的这座军营才是家,而生长我的山东只能叫作老家。

从内心抵触到完全接纳,再到不能割舍,我用了整整16年时间。我知道,终有一日,我将永远离开这片土地。但是,我郑重地嘱托砚航:不管我走多远,不管身在何处,不管将来以怎样的方式离开尘世,如果可以,请将我的骨殖埋在这黄沙之间。

